



知識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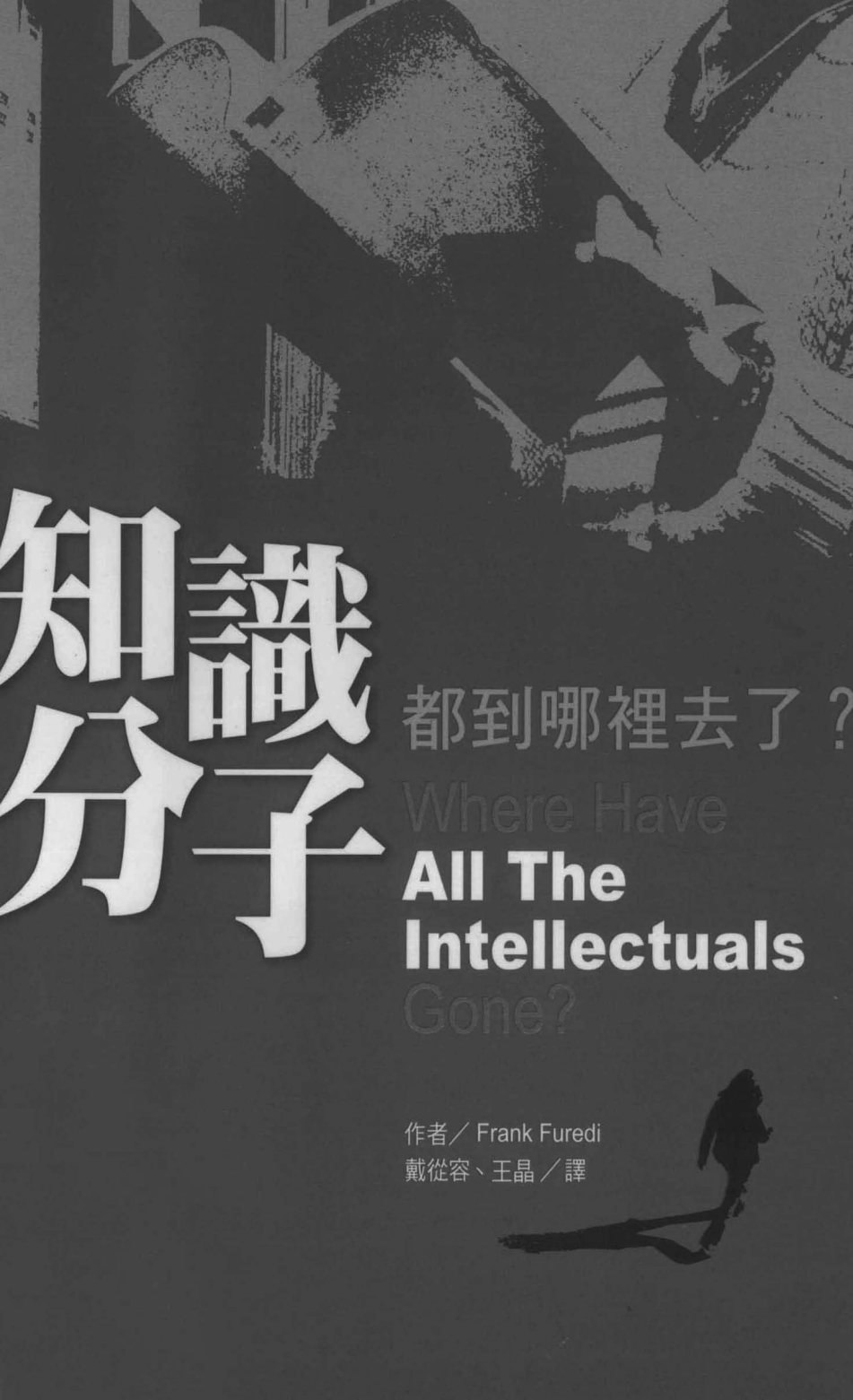
都到哪裡去了？

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

作者／Frank Furedi

戴從容、王晶／譯





知識分子

都到哪裡去了？

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

作者／Frank Furedi
戴從容、王晶／譯



現代名著譯叢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

2006年11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4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Frank Furedi
譯者	戴從容
	王晶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編輯部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02)27634300轉5042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電話：(02)26418661

台北忠孝門市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2樓
電話：(02)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門市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叢書主編 陳英哲
校對 鄭秋燕
封面設計 七夕文化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13：978-957-08-3063-7（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ISBN 10：957-08-3063-8（平裝）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The Work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本書中譯文由江蘇人民出版社授權出版。

前言

長久以來，因為嚴重的知識認知誤差而造成文化機構、大學和專科學校迷失其所，讓我相當擔憂困擾。公眾有權聽到來自文化機構高品質的學術辯論，而且，聽眾的無限潛力，也該受到更大的尊重。本書乃針對眾多聰穎的男女所寫，因他們渴望一種更具挑戰性的學術和文化生活。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書中闡述的觀點，是我在與朋友同事不斷交談中發展起來的。我在《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上發表了若干文章後，讀者來信源源不絕，也使我確信許多人與我有著同樣的擔憂。與美國的朋友討論後，發現學術機構的弱智現象不僅存在於英國。2003年夏，思想學會在倫敦(the Institute of Ideas in London)舉辦了一次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研討會，會後更促使我對此問題的研究轉向為對文化政治這一個更大的問題。

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不斷收到喬西·阿普頓(Josie Appleton)的回饋和批評。不論效果如何，我許多論點的方向都應感謝她。我也從思想學會的兩位幹將，蒂

芬妮·詹金斯(Tiffany Jenkins)和克萊爾·福克斯(Claire Fox)提供的意見中獲得許多啓發。我的同事瑪麗·埃文斯(Mary Evans)教授正在寫作《大學之死》(*Death of the University*)一書，也與我分擔了這一痛苦。珍妮·布里斯托(Jenny Bristow)幫我把手稿改得更為通順。此外，我還要感謝我的編輯，Continuum出版社的安東尼·海恩斯(Anthony Haynes)，他在本書的完成過程中慷慨相助。

目次

前 言	i
緒 論：穿越庸人之土的個人旅程	1
失去意義的知識	9
平庸崇拜	11
弱智化社會學	14
對標準的討價還價	20
從英才教育到庸才教育	23
優勝的價值	25
本書寫作目的	28
第一章：知識分子的貶值	31
從強大的主人翁到迷失的靈魂	35
怎樣才算是知識分子？	40
當代社會和知識分子	48
知識分子角色的貶值	55

順從的知識分子	58
 第二章：瑣碎的追求	63
對啓蒙傳統失去幻想	67
面對不確定性的無力感	73
相對主義：競相聲稱擁有知識	76
工具主義的妥協	86
 第三章：弱智化	89
疏離的公眾	97
最小公約數下的重新參與	106
精英式民粹主義	111
 第四章：社會改造	117
對獨立自主的攻擊	128
社會改造與市場	138
 第五章：媚俗文化	145
通過肯定實現包容	154
認可制度化	160
對平凡的頌揚	168

第六章：把大眾當兒童	175
幼兒化的文化	179
幼兒化民眾	183
反向的勢利	186
塑造溫順的公眾	194
結語	197
參考文獻	201
附 錄：英文版再版後記	209
對批評的反應	211
我們知道什麼對你最好	218
順從者對現狀的鄉愁	226
順從的結束？	229

緒論：穿越庸人之土的個人旅程

失去意義的知識

平庸崇拜

弱智化社會學

對標準的討價還價

從英才教育到庸才教育

優勝的價值

本書寫作目的

庸人(Philistine)：一個欠缺人文文化的人；一個只對物質和日常事務感興趣的人¹。

某些出乎預料的情況促使我創作了本書。2001年5月，我為《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寫了一篇題為〈如今大學起什麼作用？〉(*What is university for now?*)的文章，談到我對英國大學發展方向的若干憂慮。這篇文章主要是探討當今校園中缺乏相對的學術刺激與挑戰的情況。我提到了大學生告訴我的一些故事，他們對大學經驗深感厭倦，還說許多學生一整年可能都沒有完整地讀完一本書。

文章發表的第二天，我收到一位大學高層的憤怒電子郵件。此人顯然被我的評論所激怒，指責我「故意」混淆議題。在讀了開頭怒氣沖沖的幾行後，我以為他會指責我捏造事實，謊稱大學生一整年都沒讀一本書的指控——然而，這並不是他反駁的重點。他對大學生和書籍世界的疏遠沒意見，反而氣憤我傲慢地認定書籍應在高等教育中佔優先地位。他抱怨說：「文章的語氣顯示，如果在任何

1 A person deficient in liberal culture; one whose interests are material and commonplace. (*The Shorter Oxford Dictionary* (1963), p.1487)

一門課程中，學生沒有讀完『整本書』，你就會認為這門課沒做嚴格的要求。」就他而言，書籍成了當今大學生並非必要的課程參考資料。

這次意見交換後幾個月，他在「整本書」一詞上所加的引號，一直在我腦海中縈繞不散。我早就預料這篇文章會招來一定程度的敵意，但卻沒想到一流大學的管理者，會以這種不以爲然的態度看待閱讀。在這次通信前，我一直相信，儘管在教學方法和學術成就上各不相同，高等教育機構與我持有同樣的焦慮，對大學生顯見的平庸怠惰，即便不感到窘迫，也會感到不安。我一直認為學術熱情在高等教育中被忽視，是因為控制學術和文化生活的新管理主義風氣所造成的無心之過，卻沒想到對方會公開地頌揚庸人主義，就如來信者對讀書出乎意料地輕視所顯示。

但我不需要花腦筋就能了解，這並非一個意見不同的大學管理者的怪異反應。當今文化精英不但不知自我捍衛，還對所有學術生活的常規給予集體性的嘲笑。此外，這位精英只遵循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的原則，即只有當藝術、文化和教育成爲工具，並有更廣泛的實用目的時，才重視它們。

那些熱情地追求自己愛好的學者，則面臨被貼上

「脫離現實」(irrelevant)、「精英分子」(elitist)、「不切實際」(out-of-touch)和「邊緣化」(marginal)標籤的危險。對學問、卓越(excellence)和真理的追求，也常被描繪為古怪、任性和不切實際的追尋。「多少有點不可靠」，這是英國前教育大臣查爾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e)在對為教育而教育所做出的描述，他堅持政府沒興趣支持「學者追求真理的這種中世紀觀念」。克拉克把對知識的渴望，描繪為一種不切實際的中世紀偏見，也證實目前在教育和文化政策中瀰漫的庸人風氣。

而這類態度並非局限於英國社會或任何特殊政黨的政客。克拉克雖身為工黨，但他前任的保守黨教育首長也相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充當經濟成長的引擎。即使在知識的黃金年代，為追求思想而追求思想也只是種理想，很少成為現實。不過，至少在表面上，它被社會各重要階層視為一種理想，如今，卻逐漸與全球文化的工具主義風氣相衝突。印度孟買大學(Mumbai University)英文系前系主任瑞林達·納巴(Vrinda Nabar)指出，「無論是學生還是在大學裡，人們逐漸視人文科學和語言是不必要的個人嗜好。」² 美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在1970—1995年間，大

2 見 Shabnam Minwalla, "Commerce is the mantra of the moment in city colleges", *Education Times*, September

學外語系的學生人數下降了37%。

當然，對教育、藝術和文化的庸人態度並不新奇。十九世紀的偉大思想家們——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尼采、歌德、馬克思——已感覺到市場這非人所控的力量，是如何影響到藝術和文化的發展。然而，今天庸人主義的影響並非來自經濟現實所要求的實用主義，也不是只從外部指向教育和文化，而是連政策制定的最高層也被同化了。新種的大學管理階層、博物館和畫廊經理人，以及對文化和思想內容漠不關心的「知識」企業家，只為利用文化去達成與其內涵毫不相干的目標。

查爾斯·克拉克對「學者追求真理」這一信念表現出的蔑視，代表了我們時代的風氣。這種用懷疑的眼光看待發現真理的可能性，可從人們冷嘲熱諷的一致態度中得到證明。在以前，追求真理的口號有時是用來遮掩各種罪惡，所謂的真理是設計來支持既得利益者的意識形態。不過，至少真理會因是真理之故而受到重視。在亞里斯多德看來，真理是科學的目標：「哲學是思考真理的科學」；在愛因斯坦看來，「追求真理比擁有真理更珍貴」。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同樣也對追求真理充滿了

(續)

2003. www.educationtimes.com/arts.htm

熱情，她對她的聽眾說，「我深知假如我們希望傳授真理，我們就有責任完整地、清楚地、直言不諱地、不故作神秘地和毫無保留地傳授它，並對它的力量完全信任。」正是這樣對真理的狂熱，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

不幸的是，當下的文化認為真理只配在小說中出現，而不是智力追求的對象，還有人還不斷宣稱真理不存在；相反的，人們被敦促去接受不同的觀點，因它們代表不同的真理。傅柯(Michel Foucault)聲稱「沒有真正普遍的真理」，這一說法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現在，真理很少被當作客觀事實，而是常被描繪為主觀見解的產物，與其他同樣有效(valid)的看法相抗衡。相對主義(relativism)——認為真理和道德價值並不是絕對的，而是取決於持用的人或群體——對文化生活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觀者眼中出真理，這觀點對教育和文化機構的運作產生了深刻衝擊。假如真理被降格為主觀的看法和闡釋，就不再具有本質上的重要性。它並不攸關生死，而發掘真理也不是任何重要機構證明其合理性的主要依據，但一旦真理被視為可被質疑的主張，並與其他許多主張爭鳴，它就不再在社會文化生活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真理地位的降格對當代文化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對藝術地位的傳統看法——「美即真，真即美」——則與

那種以多重形式看待真理的潮流格格不入。學術生活同樣必須也經歷重大的修正。就如一部研究大學角色的著作所說，「自由的高等人文教育，是建立在能獲得客觀知識和真理的假定上」，接下來又補充說，「隨著當代哲學如相對主義、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和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的發展，這假定已受到質疑。」該書的作者羅恩·巴奈特(Ron Barnett)認為，「這從認識論的角度動搖了高等教育的根基。」³至少，高等教育在自詡提供通向真理之路的功用被顛覆後，其意義也就跟著改變了。

在更廣泛的文化生活中，對真理漫不經心的態度也清楚顯現。而社會能夠提供的好處，現已不再顯而易見。當「單一的文化」讓位給「多重的文化」時，任何文化在聲稱具有權威性或特殊地位時都會受到嘲笑。在真理變成如此難以捉摸的環境裡，那對高雅文化與低俗文化的傳統區分也喪失了意義。前英國文化大臣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回應了這個情緒，聲稱對「高雅文化」與「低俗文化」的區分是種誤導，「喬治·本傑明(George Benjamin)⁴ 與諾埃爾·加拉格爾(Noel Gallagher)⁵ 同樣

3 Barnett (1990), p.x.

4 譯註：英國當代作曲家和指揮家，創作了許多管弦樂、室內樂和鋼琴曲作品。

5 譯註：英國流行樂團綠洲(Oasis)的主唱。

都是一流的音樂家」。

縱看人類歷史，主流文化總宣稱代表著真理；如今，這種觀點往往受到懷疑。事實上，這類說法不斷被抨擊為精英主義論調，而對卓越和更高水準的渴望，則被貶斥為對黃金時代的愚蠢哀悼。精英主義曾經自覺地貶低民眾，來證明自身對經濟、文化和政治權力壟斷的合理性，現在則被重新定義是種判定某種文化高於另一種文化的行為。讓人吃驚的是，這類觀點往往影響到所有的觀感。並非只有所謂的文化左派排斥客觀的知識——連文化精英自己也不願意認定任何直覺的文化價值和真理。文化精英不去捍衛自己的權威，反而積極地與聯繫現實、向公眾開放，以及與流行觀念掛勾。

失去意義的知識

矛盾的是，對客觀知識的懷疑態度與一種流行的看法——即我們生活在「知識社會」（Knowledge Society）——並存，並常說「知識就是力量」。評論者不斷聲稱必須回應「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的要求，高等教育的擴大和舉辦其他文化活動，也因知識社會發展的所需而被認為是合理的。推廣大學和其他教育機構